

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 组编

“历史新起点”书系

中国文化体制 改革与建设研究

主编 刘克利 栾永玉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委托项目结项成果
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 组编
“历史新起点”书系

中国文化体制改革与建设研究

主 编 刘克利 栾永玉
副主编 龙佳解 柳礼泉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文化体制改革与建设研究/刘克利, 栾永玉主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历史新起点”书系)

ISBN 978-7-300-10841-4

I. 中…

II. ①刘…②栾…

III. 文化事业-建设-研究-中国

IV. G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95704 号

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 组编

“历史新起点”书系

中国文化体制改革与建设研究

主 编 刘克利 栾永玉

副主编 龙佳解 柳礼泉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58 mm×236 mm 16 开本

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印 张 14.75 插页 2

印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53 000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总 序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认真总结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突出成就和宝贵经验，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入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努力开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新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正确领导下，经过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几十年的共同努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中、在教育改革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巩固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发挥了“思想库”和“智囊团”的作用，造就了一支宏大的理论研究队伍，初步形成了一套科学管理体制机制。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是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当之无愧的主力军，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进党的理论创新，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近年来，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既教书育人又潜心治学，积极参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努力构建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繁荣启示我们：一是必须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贯穿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中去，用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决不能搞指导思想多元化。这是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二是必须始终坚持改革创新，大力推动学科体系建设，不断推进学术观点和科研方法的创新，努力在学科建设、教材建设、教育教学等各个环节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这是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不竭源泉。三是必须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立足国情、面向世界，以深入研究和解决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切实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提出的一系列重大课题。

这是体现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自身价值的重要基础。四是必须始终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充分发扬学术民主，努力营造生动活泼、求真务实的学术环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这是促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健康发展的基本方针。五是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大学生，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是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任务。六是必须始终坚持哲学社会科学队伍建设，深化人事制度改革，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和加强学术道德修养，转变科研组织、管理方式，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充分调动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其始终保持优良的学风和严谨的治学态度。这是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健康发展的有力保障。

党的十七大对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大力推进理论创新、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三大任务。这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指明了方向。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新的起点上进一步推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要求我们努力做到：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大力推进理论创新，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理论支撑；结合高校特点和实际，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建设，继续打牢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坚实基础；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培养造就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别是中青年理论家。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创新的根本要求，也是哲学社会科学人才成长的最重要的途径。“历史新起点”书系，阐明了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实践发展和理论创新的脉络，展现了我国社会发展进程中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理论思考和一些重大理论探索的研究成果。这套书凝聚着十几所高校的一百多位专家学者的心血，针对当前师生关注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进行分析和梳理，理论观点正确，研究较为深入。可以作为高校党务政工干部、思想政治理论课和哲学社会科学课教师、大学生骨干的教学、科研和学习的参考书。

理论研究和探索没有止境。希望我们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继续发扬优良传统，坚持理论联系实际，通过扎实的研究，不断提升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质量和水平，为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促进教育事业科学发展作出新的理论贡献。

是为序。

教育部副部长



第一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建设的社会语境

任何文化都是人们实践活动的结晶，这种实践活动是在一定时代背景下开展的，同时又以批评继承前人所留下的文化成果为前提，它们构成了文化形成和发展的社会语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诞生和发展的。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实践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发展以各种规定性。因此，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时代背景、文化资源以及实践中提出的新课题成为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容、特质与成果的起点。

第一节 复杂而深刻的时代背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在经济全球化已经形成和政治多极化成为发展趋势的国际环境下进行的。社会主义从经济、政治到文化的运行和管理体制的全面改革，以及开放政策实施后所形成的同西方各国文化交流的蓬勃发展态势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国内环境。

一、经济体制改革与新利益群体的形成

恩格斯指出：“使人们行动起来的一切，都必然要经过他们的头脑；但是这一切在人们的头脑中采取什么形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各种情况决定的。”^① 这说明我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既受客观世界发展状况的制约，同时又取决于我们自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2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身的主观努力。

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反复强调要恢复“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是因为“四人帮”横行时期，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猖獗，致使我们对国际环境和国内阶级斗争状况作出了错误的估量。邓小平果断地提出20世纪70年代的主题已经转移到和平与发展上来。“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①这种对新时代基本特征的认识，构成了将经济建设作为党的中心工作，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的前提。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求党必须坚持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当作当代中国的最大国情，必须将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实践的根本任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要求党根据生产力发展不平衡的具体状况，对原来的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进行调整和改革，建构起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与此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提供制度基础。

改革开放初期的1980年，在我国工业企业总产值中，国有经济总产值为3 915.60亿元，占75.97%，集体经济总产值为1 231.36亿元，占23.54%，两者合计占99.51%；城乡个体经济总产值为0.89亿元，占0.02%，其他非公有制经济总产值为24.49亿元，占0.47%。^②在1978年，在城镇私营企业和个体企业就业人数仅为15万人。这时基本上是公有制经济一统天下。而在2002年，我国工业总产值110 776.48亿元，其中国有经济总产值为45 178.96亿元，占40.78%，集体经济总产值为9 618.95亿元，占8.68%，两者合计占49.46%；非公有制经济总产值为55 978.57亿元，占50.53%，其中港澳台商投资企业总产值为13 668.81亿元，外商投资企业总产值为18 790.47亿元。^③在私营企业和个体企业就业人数上升到8 152.2万人，其中私营企业投资者人数就已达622.8万人。^④

根据上述数据，可以看出，我国经济的发展目前是由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实体共同推动的，其中非公有制经济实体作出的贡献已达一半左右。因此，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

① 《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1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② 参见《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2003）》，25、26页，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

③ 参见《中国统计年鉴（2003）》，459页，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

④ 参见上书，146、148页。

本经济制度已经形成。

社会生产力的长足发展推动了我国经济领域产业结构的重大变化，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下降，第二、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上升。1978年，我国的国民总收入共计3 624.1亿元，其中第一产业1 018.4亿元，占28.1%；第二产业1 745.2亿元，占48.2%；第三产业860.5亿元，占23.7%。当时第一产业从业人数28 318万人，占总从业人数的70.5%；第二产业从业人数6 945万人，占总从业人数的17.3%；第三产业从业人数4 890万人，占总从业人数的12.2%。^①在2002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共计104 790.6亿元，其中第一产业16 117.3亿元，占15.4%；第二产业53 540.7亿元，占51.1%；第三产业35 132.6亿元，占33.5%。第一产业从业人数36 870万人，占总从业人数的50.0%；第二产业从业人数15 780万人，占总从业人数的21.4%；第三产业从业人数21 090万人，占总从业人数的28.6%。^②这两组数据，证实了我国经济领域产业结构的巨大变化。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实现人们的经济利益的制度基础，因此它构成了社会分层的制度基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变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及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化是我国社会发生阶层分化，产生新的社会阶层和形成不同的利益群体的主要原因。与改革开放前公有制的一统天下相比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所有制形式的多样性以及生产力发展所形成的第三产业的发展壮大，使得利益群体分化成为我国现阶段社会结构的最显著的特征。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直到改革开放前夕，我国社会基本上是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三大社会群体构成，其中知识分子阶层又可分为党政管理干部和业务技术干部两大类。

新时期，随着生产关系的调整 and 改革，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的格局的形成，在传统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三大群体之外，诞生了新的社会阶层，归纳起来有六个：（1）私营企业主。私营企业指企业财产归私人所有、雇工人数较多的营利性经济组织。据统计，截至2001年底，全国登记在册的私营企业已达202.85万户，注册资本总额为18 212.24亿元。其中，注册资本在1 000万元以上的有2.31万户，亿元

^① 参见阎志民主编：《中国现阶段阶级阶层研究》，12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

^② 参见《中国统计年鉴（2003）》，55、124页。

以上的有 383 户。^① 私营企业主正日益成为经济实力、经营范围与社会影响不断扩大的社会阶层。他们中许多人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或政协组织中当选为代表或委员。(2) 个体户。即个体工商户，是以家庭为单位，拥有一定资金、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最早出现的一个新的社会阶层。截至 2001 年底，全国登记在册的个体工商户为 2 433 万户，注册资金 3 435.79 亿元。^② (3) 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民营科技企业，泛指以科技人员为主体，按照自筹资金、自愿组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原则创办和经营，主要从事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务和成果转化的经济组织，它们在经济类型上也属于私营企业经济，只是经营对象不同，并且大都按股份制方式运作。(4) 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他们是受聘于外资企业的中方管理人员或技术人员，通常年纪轻、学历高，并且许多人具有在国外留学、就业的经历，一般在外企的一些部门担任骨干。(5) 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所谓中介组织泛指介于企业和个人之间，并为企业和个人服务以及对企业和个人进行监督的社会组织，主要有三类：行业性中介组织、公正性中介组织、服务性中介组织。这些组织的从业人员大多受过专门训练，专业化程度比较高。(6) 自由职业人员。主要是指那些不固定供职于任何经济组织、事业单位或政府部门，凭借自己的知识、技术或专长为社会提供某种服务并获取报酬的人员，主要包括自由撰稿人等文化、艺术工作者。

以上六个社会阶层都是从原有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三大群体中分化出来的。譬如，私人企业主的社会来源就有：个体工商户、专业户和手艺人；私营企业的雇员或合伙人；国有、集体企业的经营者、管理者；农民或国有、集体单位的职工；国有企事业单位的科技人员；待业青年和毕业学生；传统体制的“疏离者”，如刑满释放人员、解除劳动教养人员、社会闲散人员等。^③ 这六个新社会阶层的出现，改变了我国原有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的社会结构，社会阶层结构的构成出现了新状况。

现今国内外社会学界认为，财产、权威和技能是现代社会阶层分化的三个主要根源。根据上述共识性的观点，我国有学者认为，在当前中

^① 参见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编：《干部群众关心的 25 个理论问题》，75 页，北京，学习出版社，2003。

^② 参见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编：《干部群众关心的 25 个理论问题》，74 页。

^③ 参见阎志民主编：《中国现阶段阶级阶层研究》，311 页。

国社会里，公共权力与市场能力构成了阶层分化的主要动力基础。^① 公共权力主要指国家政权赋予的权力，表现为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权力和代表人民占有公有财产的权力。市场能力指人们在市场竞争中将自己所控制的资产权，包括经济资本产权和人力资本产权，付诸实际交易的能力。由此出发，有学者将我国目前城市的社会阶层结构划分为五类：社会上层、中产上层、中产下层、技术工人及小职员阶层和非技术工人与个体劳动者阶层。这五个社会阶层对目前生活幸福感的看法有一定程度上的差异，见表 1—1：

表 1—1 五个社会阶层对目前生活幸福感的看法

	社会上层	中产上层	中产下层	技术工人及小职员阶层	非技术工人与个体劳动者阶层
幸福	53.8%	54.1%	50.8%	36.0%	32.2%
一般	38.5%	44.9%	46.9%	56.0%	55.8%
不幸福	7.7%	1.0%	2.3%	8.0%	12.0%

资料来源：刘欣：《中国城市的阶层结构与中产阶层的定位》，载《社会学研究》，2007（6），9 页。

综上所述，改革社会主义经济领域的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确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生产关系体系，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要求，极大地推动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带来了社会阶层的分化。原有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三大群体已经分化为更为复杂多样的社会阶层、社会群体。他们之间既有着共同的利益需求，又有着不可忽视的利益差异。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正视的客观的社会结构环境。

二、实行对外开放与文化交流的繁荣

人类文明的发展除了依靠各个民族、国家的自身力量之外，还离不开他们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人类文明史已经证实，世界上凡是文明的交流与融合发生得比较频繁的地区，其文明的发展程度总是处于领先的地位。改革开放前，我国仅单方面向亚、非、拉的第三世界国家开放，而与西方发达国家保持隔绝状态，使我们失去了利用世界先进文明来发展自己的机遇。所以，邓小平说：“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

^① 参见刘欣：《中国城市的阶层结构与中产阶层的定位》，载《社会学研究》，2007（6），4 页。

达不起来的。”^① 因此进入新时期以来，我国相继在经济、科技、教育、文化领域采取了一系列开放举措。

第一个重大举措是创办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个经济特区。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了广东省负责人提出的在广东试办出口加工区的建议。随后由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组成工作组前往广东、福建考察调研。197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1980年8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批准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设置经济特区。这四个经济特区成为我国初期对外开放的窗口和改革的试验场。

第二个重大举措是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1984年3月26日至4月6日，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着重研究了沿海部分港口城市如何进一步开放的问题。1984年5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正式确定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14个沿海港口城市。至此，我国沿海总共15个港口城市都成为开放城市，其中厦门早已列为经济特区。当时国际舆论认为，“开放整个海岸，意味着实际开放半个中国”，这个战略决策是新中国成立35年以来“采取的最大胆的行动”，“是中国从明朝以后的第一次开放”。

第三个重要举措是开辟沿海经济开放区。为了更好地搞活经济，扩大国内开放的领域，国务院于1985年1月召开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座谈会。会议一致主张，先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继而将辽东半岛开辟为经济开放区，以加速沿海经济发展，从而带动内地经济开发。1985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这个座谈会纪要。这样，我国的对外开放就通过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由外向内、从点到面的逐步扩张的路径不断深入。

第四个重要举措是实施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战略。在对外开放不断取得新进展的形势下，国务院在1987年底提出实施我国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战略。这个战略的主要内容是：利用我国沿海地区劳动力资源丰富且素质较高的优势，以“三来一补”等形式，引进外资、先进技术和必要的原材料，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劳动密集与知

^① 《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1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识密集相结合的产业，把加工的产品打入国际市场，做到“两头在外，大进大出”。这样就能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经济的交换和竞争，促进我国对外经济合作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对外开放的政策不仅在经济、科技领域得以落实，而且在文化、教育领域也得以落实，这主要表现在派出留学生和智力引进上。1950年至1977年，我国派出的留学生总人数是11 915人。^①1978年邓小平提出了扩大派出留学人员的意见，当年我国向世界28个国家派出了860名留学人员，其中公派人员480名^②，成为新中国历史上派出留学生最多的一年。1981年12月11日，由美国人主持的托福考试在我国的北京、上海、广州3座城市举办，考生共有630余人。1985年，托福考点发展到8座城市，仅北京市就有8 000人参加。1987年，中国国外考试协调处在全国15座城市开设了29个考点。在当年的前3次考试中，仅北京地区就有2.6万人参加。此后，考点不断增加。参加托福考试的绝大部分是自费留学人员。1983年全年，上海办理自费出国的有3 000余人。1987年1月至9月，便达14 000多人。^③北京大学物理系77级学生有100多名，50%以上学生在国外，其中大多数是自费留学。中国科学院攻读硕士学位的5 300名研究生，2/3与国外院校有联系。据统计，自1978年至2002年底，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58.3万人，是改革开放前出国留学人员总数的48.9倍。仅2002年度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就已达12.5万人。其中，国家公派0.35万人，单位公派0.45万人，自费留学11.7万人。^④

根据有关材料证实，出国留学人员90%以上是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大学生、研究生、教师、科研人员和文艺、体育等专业人才。“出国热”表明，党的对外开放政策直接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的前途、命运，并且深刻地影响到中国文化的发展。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实力的提升，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吸引留学人员回国参与现代化建设的政策，为我国海外留学人员创造了许多工作机遇和良好的工作条件。20世纪80年代的“出国热”在90年代末开始转变为“归国潮”。许多出国留学人员学成回国，成为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甚至是党政机关的骨

① 参见《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980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

② 参见王鸿模、苏品端：《改革开放的征程》，454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

③ 参见上书，457页。

④ 参见《中国教育年鉴（2003）》，343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干。从1950年到1977年,毕业回国的留学生人数是6 928人。^①从1978年至2002年底,留学回国人员总数是153万人。仍在国外留学的43万人中,有27万人当时正在国外高等教育机构学习。^②

与此同时,外国留学生人数也大幅度增加。1952年至1977年底总计25年,我国共接收外国留学生9 292人。^③然而,从1978年至2002年底,同样是25年,我国共接收来自175个国家的8.58万各类来华留学生,分布在中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395所高校学习。其中,长期留学生6.05万名,占来华留学生总数的70.5%;短期留学生(学习时间在6个月以内)2.53万名,占29.5%。^④两组数字比较,1978—2002年间所接收的外国留学生人数是1952—1977年间的9.2倍。

我国还大力开展了智力引进的学术交流活动。自1978年起,我国一些高校恢复了邀请外国教授、专家来中国进行短期讲学的制度。当年,就有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法国、日本、美国、英国、联邦德国、叙利亚10个国家约100余名教授、专家来我国短期讲学,1979年人数增加到495名,他们来自15个国家,分布在我国40所高校。并且一些高校聘请了长期在华任教专家335名,他们来自28个国家。以后来华专家人数逐年递增,1980年长期任教专家545名,他们来自32个国家,分布在102所高校;短期讲学专家710名,他们来自20个国家,分布在47所高校。1981年,长期任教专家560名,他们来自29个国家,分布在103所高校;短期讲学专家730名,他们来自20个国家,分布在58所高校。^⑤到了1998年,我国国内各类高校共聘请外国专家、教授和外籍教师13 538人,其中长期任教3 607人,短期讲学9 931人。教授语言者4 134人,其他各专业人员9 404人。^⑥

对外开放以来,我国高校与国外高校的校际交流已成为一种制度。1978年8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吉林大学和中山大学首先牵头与美国的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威斯康星大学、拉特格斯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建立了校际联系。到1982年上半年已有24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115所高校

① 参见《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980页。

② 参见《中国教育年鉴(2003)》,343页。

③ 参见《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981页。

④ 参见《中国教育年鉴(2003)》,343页。

⑤ 参见《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672页。

⑥ 参见《中国教育年鉴(1999)》,390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与 22 个国家 250 所高校开展校际交流。^① 这种校际交流的主要内容是：(1) 互派代表团；(2) 互派留学人员；(3) 开展学术交流和科技合作；(4) 举办各种短训班；(5) 互换图书资料。

中外合作办学是改革开放以来诞生的文化交流新形式。据统计，截至 2002 年底，全国共有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 712 个，与 1995 年相比，增加了 9 倍多。它覆盖了全国 28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外方合作者排名前 10 位的是：美国 154 个，澳大利亚 146 个，加拿大 74 个，日本 58 个，新加坡 46 个，英国 40 个，法国 24 个，德国 14 个，韩国 12 个。^② 办学层次：幼儿园 27 个，初中 2 个，高中 40 个，职业学校 69 个，中专 36 个，大专 82 个，大学本科 69 个，研究生 74 个。学历教育机构 372 个，非学历教育机构 313 个。办学专业分布：工商管理类 255 个，占 36%；外国语言文学类 132 个，占 19%；电气信息类 94 个，占 13%；经济学类 74 个，占 10%；艺术类 37 个，占 5%；教育学类 19 个，占 3%；其他 101 个，占 14%。^③

此外，这种智力引进还表现在外国图书进口方面。2002 年，我国图书、报纸、期刊累计进口 548 852 种，达到 1 418.63 万册；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累计进口 12 428 种，829 511 盒（张）。就各专业来看，累计进口哲学社会科学类 100 031 种次，38.05 万册；文化教育类 104 930 种次，58.49 万册；自然科学类 191 894 种次，54.1 万册；少儿读物类 27 475 种次，15.93 万册；综合类 12 927 种次，33.52 万册。^④

综上所述，我国对外文化交流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

第二节 丰沛而多样的文化资源

任何文化的发展都要以现有的文化资源为起点，文化建设离不开所处时代的知识分子对过去时代的文化遗产以及当今时代的人类文化成果的借鉴与利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正是在一个文化资源非常丰富多样的社会情境中开展的。这有利于建构出富有生机与活力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① 参见《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675 页。

② 参见《中国教育年鉴（2003）》，349 页。

③ 参见上书，349 页。

④ 参见《中国出版年鉴（2003）》，675 页，北京，中国出版年鉴社，2003。

一、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国是一个有着 5 000 多年文明史的国家，早在公元前 2 000 多年的夏王朝，中国就创造出堪与世界其他文明古国比肩的灿烂文化。这种文化以后又被历代王朝所推进和扩展，一直绵延到近代，形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统。这种曾经在历史上创造过辉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统，成为今天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宝贵遗产。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博大精深，在此只择其要者略述之。

1. 国家理念与治国方略

第一，“民惟邦本”的民本主义国家观。这种民本思想在西周的“敬德保民”的治国思想中就已经诞生。以后又在春秋末期的儒、道、墨三家思想中体现出来，并且为他们所极力倡导。

第二，以“民惟邦本”国家观为基点的治国方略。在儒家那里，表现为“德治”、“仁政”；在道家那里，表现为“无为而治”，主张在治国上要顺应自然天道和社会人道，因势利导，不能肆意妄为；在墨家那里，表现为“相爱相利”，通过给天下人以利，来实现“兼爱天下”的目标。

第三，举贤任能的用人标准。墨家“尚贤”，明确主张实现理想政治，要用贤德之人，国家政权应该向“农与工肆之人”（《墨子·尚贤上》）开放。儒家虽然在用人上有“亲亲”观念，但是从其“内圣外王”的观念出发，总体上是强调治国之人应是在德与才两方面都高于常人的。如，孔子认为人才的标准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举贤任能的用人标准是我国传统政治实践中的基本准则，比如汉光武帝曾下诏要以“四科”选士，“四科”即“德行高妙、志节清白”，“学通行修，经中博士”，“明达法令，足以决疑”，“刚毅多略，遭事不惑”^①。虽然世卿世禄制在皇亲国戚中也存在，但对于整个文官系统来说，它不占主导地位。

第四，选拔人才的科举考试选官制度。科举制度是指朝廷允许普通读书人自愿向官府报名，经过分科考试，依照成绩从中选取人才和授给官职的制度。一方面，这种制度为处于社会下层的普通人开通了向社会上层流动的渠道，有利于激发和利用社会下层群体的创造性潜能，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社会上层的吐故纳新。另一方面，这种制度以考试的形

^① 转引自阴法鲁、许树安主编：《中国古代文化史》，第3册，32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式，根据考试成绩择优录取，从而避免了在选官制度上任人唯亲的现象，从制度上实现了某种程度上的社会公正。之所以有人诟病传统科举制度，是因为它成为了唯一的选官渠道，认为应该有其他的选官途径与之相配合，以弥补其不足，另外这种制度自身有需要不断完善之处。

2. 政治意识与社会理想

第一，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的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主义以民族及其国家的认同和归属感为基础，主要表现在对国家利益和前途的强烈关注，由此而产生的对祖国美好未来的执著追求，为维护祖国统一与尊严而献身的精神，以及对本民族所创造的文明和大好河山的热爱和自豪等。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爱国主义传统。在古代有域外牧羊而气节不变的苏武、抗金报国之志不改的岳飞、英勇就义正气凌云的文天祥、矢志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等数不胜数的仁人志士。在近代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又涌现出成千上万的革命先辈和先烈。他们爱国主义的坚贞和英雄壮举演化为一股强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传统。“位卑未敢忘忧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等抒发爱国情怀的名言是激励中华民族儿女为祖国和民族利益而英勇献身的巨大精神力量，也是当今时代培育国人爱国主义情感的重要精神资源。

第二，政治忧患意识。“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孟子·告子下》）。据史籍记载，这种忧患意识产生于西周克商而形成的“小邦代大国”的政治环境，是周公旦治国理念的重要内容之一。这种政治忧患意识体现了人的理性自觉。一方面，它表现出当事者对吉凶成败的深思熟虑而形成的远见，另一方面，它也强调了当事者对自己行为所应负的责任。

第三，儒家的政治批判精神。这种政治批判精神一方面表现为儒家知识分子将夏商周三代政治制度理想化，以此作为衡量现实政治的标准，从而进行匡正时弊的批判，甚至导致颂扬“汤武革命”的某种革命精神；另一方面又主张知识分子应该培养自己的大丈夫的浩然之气，坚守自己的道德意志，反对同世俗生活同流合污。

第四，包容和谐的精神。中国传统文化从“天人合一”的信仰出发，视天地人为统一整体，崇尚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全方面、多层面的和谐，以中正和谐为理想境界，形成了“贵和”的理念。从文化实践来看，这种包容和谐的精神，表现为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胸襟以及和而不同、宽以待人的宽容态度。在古代，它表现为儒释道三家互补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框架。在近代则表现为对西方文化采取为

我所用的态度，而不是拒斥守旧。从国际关系看，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同周边国家和睦相处，主张避免战争，视战争为罪恶。在对待其他民族方面，中国传统文化没有人种偏见，和平宽厚，中国一直享有礼仪之邦的美誉。

第五，现实的小康社会与理想的大同世界的社会发展阶段论。儒家向往“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并且描绘了“大同世界”的美好图景。同时儒家又不沉溺于幻想，而认为在现实中只能追求每个人、每个家庭都从自我出发，同时用完备的道德礼仪和法律来规范约束人们的私利行为，从而形成秩序井然的社会。这种社会被称为小康。“小康”与“大同”的区别表现出儒家的社会理想的现实性与理想性相结合的特点。

第六，崇尚统一的精神。在中国古代传统中，崇尚统一的表述方式就是《春秋公羊传》首先提出的“大一统”的概念。所谓“大一统”，就是将中华民族视为一个整体，从而实现国家统一，保持族群的完整性。^①这种崇尚统一的精神，在情感上表现为对共同祖先——传说中的黄帝和炎帝——的认同，不仅是汉族，就是其他许多少数民族也都自认为是炎黄子孙。在政治价值取向上，各民族形成了以国家统一为乐、以江山分裂为忧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是形成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精神力量，也是爱国主义精神的表现形式之一。

3. 家庭、社会伦理道德文化

中华民族注重道德精神，这一特点在世界各个民族中尤为显著。自西周开始的“敬德保民”的治国理念发展到春秋末期的儒家、墨家、道家以及法家等，都主张努力追求道德境界的提升，反对堕于物欲而不能自拔。尤其是儒家将人是否有道德作为人与禽兽相区别的根本标志，将道德境界的高低视作衡量人生价值的主要标准，将内在人格的完善看作成就事功的基础，并由此发展出一套特别强调道德自律性的道德自修理论。从这种意义上，将中国传统文化视作一种“耻感文化”，即将道德上的荣耻视作某种至高无上的东西。

中国传统文化注重道德伦理主要表现在家庭伦理和社会伦理两个层面。

家庭伦理的根本内容是孝、悌，主要强调子女对父母，弟妹对兄姊的顺从与尊敬。另外，它要求父母必须尽赡养子女、兄姊必须尽帮助弟妹的义务，即父母要慈、兄姊要友。此外在夫妻关系上，既主张男女有

^① 参见宋志明、吴潜涛主编：《中华民族精神论纲》，30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